

**综**观21世纪当代艺术的发展，我们十分可喜地看到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的艺术在国际大展上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无疑对西方艺术的话语中心构成了显著的冲击。而这一切艺术的动向都根源于经济全球一体化和全球政治多极化的发展。同时这股政治社会思潮的强劲也深刻地影响着艺术的创作。在新千年以来的国际大展上，艺术变得不再单纯，它与社会、政治、经济、市场和生活的关系日益密切，这一日渐彰显的动向不禁引起了艺术界的普遍关注。特别是面对非西方国家由于政治经济的改变而带来的艺术上的活跃，西方的艺术家和策展人不得不对艺术的当下状况作出新的思考。来自各个国家的十位国际著名策展人，共同对这一系列问题展开了一次意味深长的讨论。

## Assemble the wings

插上艺术的翅膀 ◎本刊编辑部 Our Editorial Board

### ——十位卡塞尔文献展国际策展人的谈话

多样化的艺术状态是21世纪的策展动向，同时由于政治多元化而带出的非西方国家在艺术上的活跃使得他们在艺术上极具特色，另外流行文化、快乐的、性感的和享乐主义的作品也是大展中持续耀眼的风格，这两种艺术思潮似乎抢尽了各大展览的风头。

当下的展览某种程度上讲是把艺术家定义为见多识广的社会媒介，展览希望艺术家去挖掘存在于社会中的隐型问题并将这些社会问题予以全新的视觉形式夸大地呈现出来。而策展人则要履行更严谨的公众角色和文化职责，也就是策展人伊娃纳·布莱兹维克在2000年《最新精华》中所讲的“有责任的陈述”。

安德雷诺·派多萨：

的确，流行文化、快乐的、性感的和享乐主义式作品的大量突显会削弱整个展览的效果，但这是一个事实。它在卡塞尔文献展上也存在，卡塞尔文献展是一个展示性极强的展览工程，而且是执行最好的一个。但是它并不是我们策展人观摩的唯一范本，威尼斯双年展同样

也是。在第十一届卡塞尔文献展开始不久，一些人做了一个从卡塞尔到巴塞尔博览会的旅行，他们惊奇于世界顶级艺术展览和世界顶级艺术博览会两者之间在组织上和内容上的差距。正如批评家彼得·施杰尔达所说“今天的艺术商业圈子和专业圈子是分裂的两个体系，在商业中的绝大部分艺术家在专业圈子中却分文不值。”但是这看起来似乎又有些不对，从另一方面来讲你能说卡塞尔文献展或者任何一个其它的展览就能代表、展现出一个艺术家的真正样子吗？这未免也太过极权主义。也许“艺术不能改变世界，但是可以改变人们看艺术的方式”。

卢本·盖洛：

我们的讨论到现在呈现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将如何推进当今艺术策展活动的开展；二是对那些充斥于当代艺术中的以感官愉悦和反映社会为题材的大量作品的焦虑。就后者而言，这些作品的出现正是满足了像卡塞尔文献展这样国际大展的需要。同时我也不认为他们二者是相互排斥的，有很多伟大的作品成功地将这两者有效的结合在了一起。例如艺术家汉斯·哈克，他的作品不仅仅呈现出政治的争端同时还有一个美观的形式诱使观者观看。一个引人入胜的美观形式非但不是与社会题材对立，而恰恰是传递其主题的最好途径。

南希·斯派克特：

卢本·盖洛的观点是十分有洞察力的，他指出了对美和愉悦颇有颠覆性的认识。冈萨雷斯·托里斯也认为把政治和美学区分开来是错

误的，他说任何事物都脱离不了意识形态的束缚，美学最好的状态就是政治对于它无形的渗透，当我们在讨论美学的时候无非就是在讨论由一些权威者制定出来的一系列规则，美学不是讨论政治的。而它就是政治本身，最成功的政治就是表现得一点都不像政治。

查尔斯·埃瑟：

从展览上，我们可以十分鲜明的看到所谓社会政治性、或者感官愉悦刺激的作品大量存在，诚然艺术对于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变有着敏感且迅速的反映，但是这两种倾向绝不是展览唯一的两种风潮。那么之所以这个问题如此的凸显是因为展览对于自身内容的控制度，在这两个题材之间是否可以尝试做一些问题的连接呢？

贝娅特丽克丝·卢浮：

我感觉到当艺术在反映某个社会问题时，它所能产生的影响似乎没有预想中的大，但是其影响力还是不可估量的，关键就是如何使艺术从形式上贴近它所反映的主题。艺术家拉克里特·蒂拉瓦尼拉在这方面体现得非常突出。他的艺术作品构成了对西方文化新的冲击。他针对西方对于非西方的“他者”视角提出了批评，在他的艺术中可以看到他对多元文化的肯定，但绝非肤浅的形式本身。

此外，一个策展人的构想没有必要太过于民主、开放、甚至是正确无误的意向，因为策展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队伍的，通过策展只是试图要解决一个文化盲点。展览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是否构建了自己的方向和形式，是否保持一种对于观点碰撞、讨论和变化的开放心态。

长谷川佑子：

说到卡塞尔文献展，我的理解就是它是一个煞费苦心的却几乎没

有实验性的学术思想体现的学术性展览。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展览是为谁策划的，它如何为观者呈现全方位的感官感受？它是为社会还是为那个虚拟的“理智的公众”而策划的？我想展览如果能使人们在此过程中讨论艺术，远远比展览取得一次成功的历史性的轰动来得更重要。

伍得·凯特曼：

现在的展览做得越来越周密，呈现的都是精华。但是那些流行文化、快乐的、充满感官愉悦的作品，所映射的观念中没有血腥、没有甜蜜、没有眼泪。特别是文献展不同于其它的大型艺术展览，它应该是更具实验性的、危险性的、更充满惊喜的、更具幻想的，更有视觉感官冲击力的。像卡塞尔文献展通常具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视角和定位，能让人产生讨论和批评，能预知与人们艺术的发展状况，它的出版物亦是整个展览一个很好的回顾和记录。但是展览上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很多参展艺术家已经在三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以前，在很多展览中或者杂志中接触过，尽管做得如此精美但总是缺少了意味。

卢本·盖洛：

在挑选作品的过程中，我们往往将对作品的兴趣点放在了对“愉悦”和“社会政治”的关系读解上，也许我们能够利用这个观点来佐证我们所关心的某些艺术实践。我们完全能够运用自己的观念来实践博物馆中的艺术品。作为一名策展人，我渴望进入这两个不同领域：



划一个意义非凡的展览，给所有参与者带来愉悦。

**查尔斯·埃瑟：**

我利用社会尺度来评判表现“愉悦”和“社会政治”的现状。通过对现状的再创造，通过那些对作品投机性的建议，观者对作品的领会偏离艺术家的主要意图，或者说将经济变革的冲突人格化了。我选择的艺术家大多谦虚地提出了新建议：通过创造空间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觉感受，要改变观者观看世界的方式。我相信，艺术能够改变世界，通过清晰、明白无误，直接有效的方式。

**卡洛林·克里斯多夫·巴卡克夫：**

我发现文献展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当代艺术展的一种流行形式。早先一位北爱尔兰的艺术家，威利·达赫迪建立了这种模式，他的作品连接了80年代带有政治性的后现代影像作品和当代艺术实践之间的关系。今天，许多刚踏出校门的年轻艺术家的创作的观念艺术作品都被打上深深的“学院派”的烙印。我惊奇的发现几乎没有一位策展人和艺术家质疑这一点，反而宣布其“合法化”。所以，我们如何能相信一份来自CNN的文件会比一位艺术家的作品更真实可信。那么我们是否该质疑真理、记忆或者历史？就是说，我并不相信文献展是当代艺术最主要，唯一的表现形式。我主张艺术形式多样化，例如一些年轻艺术家们那些动人的，充满时髦魅力的现代作品，就好比山姆·杜兰特和朱丽叶·梅丽瑞图的作品，无论是从其形式或者写作方式上来看都从后现代主义的相对论中脱离出来了。

**长谷川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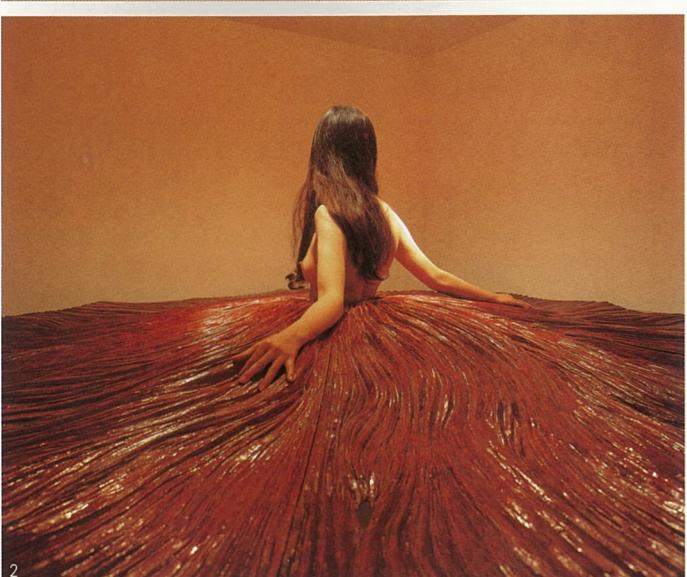
展览上的影像以及其它样式的作品共同构成了记忆，但当观者步出展厅的时候，便会很快遗忘得一干二净。影像占用了他们很长的时间，呈现出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个片断，而不是像抽象艺术那样难以理解。它可能为观众带来了一种对艺术品的即时理解，并且会下意识地成为你的记忆中的一部分。取代何种艺术形式将成为流行趋势，它重点思考的是展览如何能够成为一种记忆装置和一个可以开放讨论的处所。

**吉尔达·威利姆斯：**

一些艺术机构会经常怀疑艺术是否存在自己庞大的专业的观众，或者能与市场紧密联系的部分。在艺术界，许多艺术家觉得应该将自己与被商业污染了一切艺术区分开来。但我的经验告诉我这些艺术家其实十分愿意自己的作品能卖个好价钱的。因为在这个创作过程中，艺术家要不断受到来自市场的要求和压力。好比安迪·沃霍尔通常考虑的是如何在艺术和市场之间找到一种妥协，但这并不妨碍他创作了大批优秀的艺术作品。总而言之，我希望看到一个多一点轻松和真诚的艺术世界，其间的人，无论是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或者画廊老板，都能够全身心为了艺术大的发展而尽力。

**伊戈尔·扎贝尔：**

仅仅是直接考虑一个选择结果是错误的，基于一些基本规则下做出的简单结果。像一些策展人的决定，都是综合考虑了环境和事实下定的结果。一些可能是注重实效的，而另一些仅仅是些概念，依然十分个人化，却能够带来合理的解释。在一个大范围里，决定依然是个有限的结果。我的观点是限制条件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地位、地理条件、文化、社会和政治因素。从个人来讲，我发现自己的位置就是一种选择，就好像这个被现实左右了的视觉空间。社会和政治制度对艺术以及艺术体系起什么作用，更重要的一点是我自己有着什么样的角



**查尔斯·埃瑟：**

我利用社会尺度来评判表现“愉悦”和“社会政治”的现状。通过对现状的再创造，通过那些对作品投机性的建议，观者对作品的领会偏离艺术家的主要意图，或者说将经济变革的冲突人格化了。我选择的艺术家大多谦虚地提出了新建议：通过创造空间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觉感受，要改变观者观看世界的方式。我相信，艺术能够改变世界，通过清晰、明白无误，直接有效的方式。

**卡洛林·克里斯多夫·巴卡克夫：**

我发现文献展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当代艺术展的一种流行形式。早先一位北爱尔兰的艺术家，威利·达赫迪建立了这种模式，他的作品连接了80年代带有政治性的后现代影像作品和当代艺术实践之间的关系。今天，许多刚踏出校门的年轻艺术家的创作的观念艺术作品都被打上深深的“学院派”的烙印。我惊奇的发现几乎没有一位策展人和艺术家质疑这一点，反而宣布其“合法化”。所以，我们如何能相信一份来自CNN的文件会比一位艺术家的作品更真实可信。那么我们是否该质疑真理、记忆或者历史？就是说，我并不相信文献展是当代艺术最主要，唯一的表现形式。我主张艺术形式多样化，例如一些年轻艺术家们那些动人的，充满时髦魅力的现代作品，就好比山姆·杜兰特和朱丽叶·梅丽瑞图的作品，无论是从其形式或者写作方式上来看都从后现代主义的相对论中脱离出来了。

**长谷川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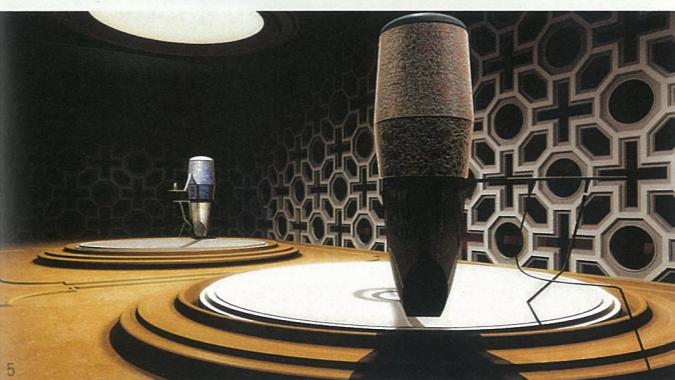
展览上的影像以及其它样式的作品共同构成了记忆，但当观者步出展厅的时候，便会很快遗忘得一干二净。影像占用了他们很长的时间，呈现出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个片断，而不是像抽象艺术那样难以理解。它可能为观众带来了一种对艺术品的即时理解，并且会下意识地成为你的记忆中的一部分。取代何种艺术形式将成为流行趋势，它重点思考的是展览如何能够成为一种记忆装置和一个可以开放讨论的处所。

**吉尔达·威利姆斯：**

一些艺术机构会经常怀疑艺术是否存在自己庞大的专业的观众，或者能与市场紧密联系的部分。在艺术界，许多艺术家觉得应该将自己与被商业污染了一切艺术区分开来。但我的经验告诉我这些艺术家其实十分愿意自己的作品能卖个好价钱的。因为在这个创作过程中，艺术家要不断受到来自市场的要求和压力。好比安迪·沃霍尔通常考虑的是如何在艺术和市场之间找到一种妥协，但这并不妨碍他创作了大批优秀的艺术作品。总而言之，我希望看到一个多一点轻松和真诚的艺术世界，其间的人，无论是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或者画廊老板，都能够全身心为了艺术大的发展而尽力。

**伊戈尔·扎贝尔：**

仅仅是直接考虑一个选择结果是错误的，基于一些基本规则下做出的简单结果。像一些策展人的决定，都是综合考虑了环境和事实下定的结果。一些可能是注重实效的，而另一些仅仅是些概念，依然十分个人化，却能够带来合理的解释。在一个大范围里，决定依然是个有限的结果。我的观点是限制条件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地位、地理条件、文化、社会和政治因素。从个人来讲，我发现自己的位置就是一种选择，就好像这个被现实左右了的视觉空间。社会和政治制度对艺术以及艺术体系起什么作用，更重要的一点是我自己有着什么样的角



色和艺术的位置。我现在艺术家的作品中有类似我自己的体会，他们没有远离自己所生活社会的各种问题，也没有在他们的作品中提出具体观点。

**查尔斯·埃瑟：**

地域问题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刚从札格拉布(克罗埃西亚首都)和卢布尔雅那(斯洛文尼亚首都)回来，在这两座城市的早期，它们的条件可能比其它城市更加突出。第一印象深深地推动我，用新的方式来审视过去。这也意味着更考虑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变化的影响，艺术家们更要吸取前人的精华。

**伊戈尔·扎贝尔：**

如果您称呼其他人叫知名艺术家时，他可能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或当代艺术中重要的人物。我想，在选择艺术家时，除了他是知名外，还应当考虑是否影响当代的艺术。我们所提倡的当代艺术的概念区别于现代艺

术的差别。当代艺术不仅仅反映在作品上，而且形成了特殊的“艺术风格”，且大大的推动了概念主义和后概念主义。当代艺术继承了传统风格。我现在可以说，当代艺术已经开始了，其结果是使得先锋艺术和实验艺术，从以往边缘的、被压制的地位一跃成为重要的新热点。当然，是“当代艺术”的血统能够使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走得更远，这也许能成就一位像杜桑一样的艺术名家。